

百年回忆客子自传（十三）

乌云密布的日子
（1960—1970年代）（二）
排华暴行似恶狼
阻扰遣侨太荒唐

1
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派往海外接运华侨的第一批四艘轮船满载着印尼的2100多名归国侨胞，到达广州港。由于新中国和印尼间的外交摩擦，新中国进行了首次大规模海外撤侨，接回华侨6万多人。

大撤侨计划：1949年，在印尼的华侨有270万之多，而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万之多。西方国家利用华侨问题大肆渲染“红色政权”威胁，宣称华侨是红色中国输出革命的载体。

1958年底，苏加诺依靠陆军镇压了地方分裂势力，担任印尼总统同时又直接接手总理的实权，作为交换，以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等为首的亲美势力得以掌控内阁。为了安抚内阁，苏加诺加紧推进有损华侨利益的经济政策。

1959年6月，印尼颁布总统令，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法令一出，各地政府遂禁止华侨从事商业零售业，对丧失生计的华侨采取强迫迁移的手段，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受影响的华侨约有50万人。此后，印尼多地发生了武力逼迫华侨动迁事件。为此，中国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计划撤侨以保护侨民利益。

1960年1月20日，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难侨回国，拉开了大撤侨的序幕。2月2日，国务院发布“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等指示。撤侨计划包括：“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集中地大量安置归侨，发挥他们的特长，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回国的华侨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青年，分送各学校学习。一些年老无亲人依靠的归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院。”

据档案记载，该项工作综合计算，国家需要投资一亿多元。

然而撤侨过程并不顺利，印尼的反华军方势力设置了重重障碍。

1960年4月，中方同印尼当局协商妥当，派遣“大宝康”号轮前往廖内省石叻班让接回国的华侨。702名华侨办妥了全部的手续，同时海关也检查了他们的全部行

李。

4月27日早上8时，“大宝康”轮刚出港，石叻班让检察官却乘坐快艇追赶“大宝康”轮，并在接近船只的时候让武装人员开枪射击，强迫中方轮船回港。中方领事当即提出抗议。27日中午11时，石叻班让警察长苏迪阿多前来告知，准许开航的决定不变，并派武装人员乘快艇护送出境。

另外，中国驻马辰领事江燕在4月27日傍晚遭到软禁，同时要求归国的华侨也受到了武力威胁。直到4月28日晚，江燕才得以带领华侨们离开。

1960年4月底，西瓜哇开始布置对华侨的武力逼返迁移。连日来，军人手持木棍到华侨家恐吓，逼迫填表。如答应加入印尼国籍并搬迁者，表上声明是自愿搬迁；如要回国的，表上要写明回国日期。两种表都附法院指控书，如到期不搬，愿受法律处分。

7月3日凌晨4点半，芝马墟军警开始布防，切断交通。5时许军警20余人到华侨家逼迁。华侨林敦煌借口邀人打球挨家挨户敲门报信，军人认为可疑。6时3刻，军警将林敦煌抓上军车，其堂嫂杨木妹将林敦煌拉下来，军人要打她，杨木妹抓住军人皮带，该军人一拳将杨木妹击倒，再用脚踢，同时朝天放枪，这时车上另一军人用手提机枪扫射，杨木妹当场毙命。其亲属叶金娘见状前往救护，亦被同一军人开枪射杀。事件中还有两人被捕，两人受伤。

经中方领事带医生验尸，发现死者杨木妹腹中有四个月胎儿，事件终致两尸三命。事件发生后，西瓜哇各大城市的华侨发动了罢工和游行示威，抗议印尼军方暴行。7月起，不愿看到事态发展失控的苏加诺开始着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芝马墟事件上，印方表示愿意负担死者的抚恤金、发放其家属的回国费用，西瓜哇军区的司令被调离，武力逼迫迁移事件也大大减少。

到1960年秋，中国政府从印尼接回6万多华侨。此后，印尼排华态势逐渐平息。（以上部分资料取自2012年“档案春秋”2012年第5期，原题：《新中国首次大规模海外撤侨始末》作者文林）

2
这里，介绍一篇丁剑先生写的“1960年印尼三宝垄大撤侨纪实”文章：

1959年年底，一场巨大的政策性灾难，使数十万在印尼乡下经商的华人陷入绝境。



面对大批流离失所而又自愿回国的海外游子，祖国政府敞开了怀抱。

在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遣侨”风暴中，三宝垄中华总会以古道热肠之心，向中爪哇省数千名归国难侨伸出援手。

作为整个援助行动的总指挥，总会主席何隆朝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堪称运筹帷幄，大智大勇，为其赢得的声望至今为人传颂。

少年时代曾在印尼乡下做过小生意的何隆朝，对此有着精辟的见解：

华侨先辈下南洋，每到一个地方，都属于“外来者”，没有土地。而中国人天生善良，虽然大家在国内老家都很熟悉农业生产，但不会像荷兰人那样用武力去抢夺人家的土地，因此不可能再来这里种田当农民。

所以，一代一代来乡下的华侨，只好学做买卖，变成小商小贩。中国人能吃苦，脑子又好用，很会深入穷乡僻壤，把城里生产的日用品送到当地农民手中，然后再收购各种农业土特产品，运到城市卖给较大的公司，靠赚取蝇头小利过日子。发展了才会搬到大城市，我小时候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何先生还告诉笔者：“1960年中爪哇开始遣侨的时候，我就找当地官员和三宝垄警察署长交涉过。我说，排华对你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嘛！我打了一个比方，华人在乡镇开的各种各样的店铺，形成了城乡社会商品流通领域不可缺少的网络，就好像是一个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你把县以下小地方的华商都赶走了，就等于把国家的毛细血管割断了，经济生活也会受影响嘛！”

何隆朝和他领导的三宝垄中华总会，多年来与当地一些政要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他可以直接找这些人交涉。当然，何隆朝的忠告，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决定，一批又一批在乡下经商的华侨被迫流离失所。

前往三宝垄接侨的是一艘中国政府租用的苏联轮船。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何隆朝带领的中华总会，全力以赴投入到协助、照料同胞顺利上船回国的“遣侨”工作中。

中爪哇省各地自愿回国的难侨大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先分期集中到省会三宝垄，再分批从这里坐船回国。

这艘苏联远洋客轮每趟可运载旅客2000来人，由三宝垄港到中国广州，往返一次20天左右。因此，一批批的难侨到三宝垄后，需要在这儿找个落脚的地方，住上10天半月等候国内接侨的轮船。

每当难侨登船回国之时，码头上就会呈现出一种巨大的不和谐的情景。

一边是印尼士兵在吉普车上架着机枪，枪口虎视眈眈地对准排队上船的人群，气氛紧张得犹如战场；另一边则是佩带袖标的中华总会“志愿者”扶老携幼，热情亲切地为难侨们送行。不少难侨上船之后，一看到船尾飘扬的五星红旗，便鞠躬行礼，有的人还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祖国的工作人员哽咽流泪。

一家一户的难侨，每天从中爪哇四面八方的乡镇涌向省城三宝垄。很多人家都是祖孙三代一起走，既有六七十岁步履蹒跚的老人，又有抱在怀里嗷嗷待哺的婴儿。难侨中，有的已经在印尼乡下生活了好几代，基本上把这里当成了故乡，并和周围的原住民邻居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可是政府施暴，

掀起排华恶浪，他们不得不走，去投奔陌生的祖国。

家境富裕的难侨，变卖了财产，收拾好金银细软，随身行李倒是不多；而大部分难侨都是小商小贩，没有多少积蓄，又不知道回国后怎么生活，只好把家里能带走的的东西全都装上牛车，或者雇辆汽车一起拉到三宝垄。

难侨们一次二三千人，呼啦啦来到三室垅等候下一班船回国，这么多人白天要吃饭，夜晚要睡觉，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中转接待工作可谓异常繁重。而中华总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临时安置好这些难侨同胞。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人员也不断到三室垅等回国难侨集中上船的港口城市巡视，一方面安抚难侨同胞，另一方面代表中国政府与当地进行必要的交涉，同时与协助做好遣侨工作的各华人社团保持密切联系。

作为三宝垄“华总”的掌门人，在第一批难侨到来之前，何隆朝即在中国驻印尼总领馆指导下，以雷厉风行之势，把本市玉融（福清）公会、闽南公会、客家公会、潮州公会、广肇公会等所有华人社团都动员起来。他召集总会全体理事开会，说明现在是非常时期，华社一切设施均要用起来为“遣侨”服务。与此同时，何隆朝同各上述各华侨同乡团体商量后，决定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成立“三宝垄中华总会遣侨指挥部”，由主席何隆朝任总指挥。组织各华社骨干，在指挥部领导下

